

叶君健近作





叶君健近作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成都

封面设计 陈世五

**叶君健近作**

---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5.75插页4字数108千

1979年6月第一版 1979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00 册

---

书号：10118·143 定价：0.42 元

## 出版说明

“杜云古稀今日壮，伫看新作涌如泉。”

深受广大读者关注的老作家，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新长征路上，革命青春焕发，创作了一些体裁不同、风格各异，而又寓有深意的新作。为了满足各方面的要求，我们编辑了一套《近作丛书》，将陆续同读者见面。

《叶君健近作》，编入的是作者近年写的童话、小说、散文等作品。描写细腻，寓理于情，是这些作品鲜明的特点。

# 目 录

<b>莫特纳雄耐尔</b> .....	1
——记路易·艾黎同志	
<b>姐 姐</b> .....	41
<b>磨工、修道院长和皇帝</b> .....	82
<b>染工的造反</b> .....	92
<b>“傻 子”</b> .....	102
<b>《安徒生童话全集》译者前言</b> .....	122
<b>《外国童话选》代序</b> .....	133
<b>两点希望</b> .....	140
<b>扩大儿童文学创作的领域</b> .....	144
<b>再谈“扩大儿童文学创作的领域”</b> .....	147
<b>芭蕾舞《卖火柴的小女孩》</b> .....	151

**世界语的理想和现实** ..... 157

**非洲诗选** ..... 164

**后记** ..... 179

# 英 特 纳 雄 耐 尔

——记路易·艾黎同志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一艘从香港沿着中国东海岸行驶的英国商船，微微向右掉了一下头，便进入了上海港外的吴淞口。它的速度渐渐慢下来了。这时一个年近三十的年轻人走上了甲板。他中等个子，宽肩阔胸，一双手又粗大又有力，体格象个拳师。这个青年目光炯炯地向四下眺望了一下。他立刻懂得了船的速度为什么要放慢：这里的水面上布满了各色各样的船只——从古老的帆船、木船，到近代的货轮和兵舰，好象在这里开一个古今中外船舶展览会。看着这一片混乱的上海港，青年人反而松了一口气：终于要到达旅途的目的地了。

他的名字叫路易·艾黎，他是新西兰人，一个普通教师的儿子。他现在就是从新西兰经过香港到这里来的。他的祖先是来自爱尔兰。这原是一个小小的农业国家，作为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英国的近邻，它一直是处于一种被压迫的半殖民状态之中。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爱尔兰人民就一直在为反抗英国的压迫和控制而进行斗争——至今也没有停止。路易·艾黎没有接他父亲“事业”的班，倒是继承了他祖先的反抗精神。他的名字就说明问题。“路易”源出于新西兰土著民族麻奥里人的首领路易·曼尼波托。上世纪六十年代，这位“路易”带领一批起义的麻奥里人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英军司令，以将近七倍的步兵和炮兵，包围了他所指挥的武装。在集中对他进行了三天疯狂的炮轰以后，英军司令要求他无条件地投降。他回答说，“我们将要永远地战斗下去——永远！永远！”最后他终于冲出了英军的包围圈。他的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深深引起了艾黎的感佩和崇敬。

艾黎是在资本主义开始走下坡路的时期成长起来的。在他快要到达成年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瓜分世界市场而产生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已经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人类屠杀——第一次世界大战。当然，当时的艾黎还认识不到这场战争的性质。新西兰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按照统治阶级的宣传，大英帝国的使命是保卫人类的文化、自由、基督精神和一切人间美好的东西，“这次战争是正义与邪恶势力的斗

争”，因此大英帝国的臣民有责任参加这次战争。新西兰议会特为此通过了一个征兵法案，规定适龄的新西兰青年都必须到欧洲战场去服役。在整个战争期间，这个只有一百多万人口的岛国，就输送了十一万多人，占全国人口将近百分之十。路易·艾黎也于一九一七年被输送到法国战场上去了。

他在战场上看到了什么呢？他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水渍的战壕，半截暴露在战壕壁上的士兵尸体……往来于战壕和营房之间的疲劳跋涉……炮弹、狙击手和疾病所造成的人体垃圾堆积如山……”在这样的一个战场上，一万七千多名新西兰青年失踪了，五万八千多人受了伤，占新西兰送往前线去的士兵总数的近百分之八十！这是怎样的一次战争啊？艾黎本人被毒气窒息过一次，两次受到了弹伤。一九一八年他从战场上退下来时，他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能找出一个答案——战争结束后也没有能找出一个答案。伤愈后他决定暂时不再去思索它。他和一个朋友到一个叫做塔拉纳基的荒凉地带去垦荒，在那里开辟一个放羊的牧场。

尽管这个地方荒凉，但他却能在这里得到安静。他朝夕和羊群在一起。炮火声听不见了，战友们的尸体在他的脑海中变得模糊了，他暂时忘记了这个世界，他也希望这个世界忘记掉他。这里的景色也把他带进了一个超然的境地。引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里柠檬树象魔术一样地生长……树枝被丰饶的果实压得弯弯……处处是鸟语和花香……当你在雨天爬上山坡的时候，羊齿草就温柔地摸抚你的光腿……”

在这样一个境界中，他一口气干了六年的牧羊人活计。但这个世界到底还是没有忘记掉他。他赖以为生的羊毛开始提醒他，他仍然是生活在那个矛盾重重的旧世界。羊毛的价钱在市场上从两个先令六便士一磅跌到两个便士一磅。最后，一车羊毛的收入，甚至连运到收购站的费用都抵不上。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恐慌终于也向他所在的这个荒凉地带袭来了！他不能只靠美丽的天然景色过日子。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啊？它这样发展下去行吗？

当他发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从一张旧报纸中看到一条有关中国的消息：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大革命。新兴的革命力量，正在对旧的势力进行摧枯拉朽式的全面扫荡。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中国在变动，世界也不能不变动，而这个世界也必须变动。到中国去！他起这样一个想法，便也就作出了这样一个决定。但这个消息他确实也得到晚了一点：中国的实际情况已经又有了变化。当他乘坐的那条船进入吴淞口的时候，中国已经看不出他想象中的那种轰轰烈烈的革命气氛。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阴沉的景色。外国的兵舰——英国的、美国的、日本的、法国的，甚至还包括意大利的——横陈在中国的水面上，使这阴沉的景色更加上了一层阴影。他所盼望的上海，在这弥漫的烟雾中，渐渐显露出了它朦胧的轮廓。

“啊，上海！”他低声地对这座在世界被排为第六位的大城市说，“真没有想到，你现在是如此萎靡，象伏在一群

虎视眈眈的野兽眼底下的一个俘虏！”

没有多久，他就下了船，跨过英国太古公司的船码头，走上黄浦滩。作为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上海海关大楼，就耸立在他的面前。这是一个典型英国式的建筑。离它不远就是汇丰银行大楼。这是另一个英国式的建筑。它的门口蹲踞着象征英帝国威力的两座石雕雄狮。艾黎震惊了一下：这简直象是一个英国殖民地总督府衙门！整个气氛是那么咄咄逼人！这时艾黎才意识到，他来到了上海的所谓“公共租界”，但它并不是英国的殖民地，而是国际帝国主义所共管的一个“公共”殖民地。它位置在中国领土上！

当他在作这种沉思的时候，一个中国工人正在他面前经过。这个工人一看见他，就在他面前鄙弃地啐了一口唾沫。

“为什么对我这样仇视？”他望着这个工人离去的背影问自己，“我们彼此都不认识，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冤仇呀。”

他很想走上前去，挥动他那拳师般有力的大手，与这个工人进行一番论理。但是他临时制止住了自己，因为他有一颗平易近人、通情达理的心，他想工人对他采取这种态度，一定会有其他的原因。他环顾了一下这个租界上的气氛，他马上就自己得出了一个结论：“这是因为我的鼻子长得太高、眼珠发蓝，和这块租界上的统治者有同样的面型。在中国人民眼里我是一个帝国主义的象征。”

他当时还不知道，就在他下决心要来中国的时候，蒋介

石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已经背叛了革命。这个刽子手前不久还在这个城市屠杀了大批的革命者和工人。他猜测得没有错：那个工人对他啐的那口唾沫，确实代表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感情。再经过一番思索，艾黎认识到这是一种可贵的感情，与新西兰麻奥里人的首领路易·曼尼亚波托对英国统治者所表达的那种感情有很多类似之处。

路易·艾黎没有后悔；相反，他很庆幸来到了中国。

## —

艾黎到达上海的第四天，他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这里的富豪一定不少，因为有许多公馆简直象宫殿，有花园，还有林荫小道。……但离这些宫殿式的建筑不远却又出现了蜘蛛网般的贫民窟——这里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在咳嗽，都患有肺气管病。……但人们驱使他们劳动，却比我们驱使牛马还厉害。”他决定在这里呆下来，他要看看这个作为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的上海究竟是怎样一个城市。通过一个朋友的介绍，他到作为公共租界行政机构的“工部局”所属的消防队当一名副队长。这要归功于他那副引起中国工人对他啐唾沫的、作为“帝国主义象征”的面孔——他是一个白种人。但这个职位却容许他以检查消防设备的名义，察看公共租界内一切工厂内部的情况。这些工厂的内部情况，是帝国主义和中外资本家怎样剥削中国劳动人民的一个缩影。这里最好引用艾黎本人在他的一本叫做《有办

法》的书中所写下的纪录：

“上海的缫丝厂是我所检查过的最可怕的地方。一行一行的孩子，有的还没有达到八、九岁的年龄，每天要在煮着茧子的沸腾的大铁锅旁站十二小时。他们的手指红肿，眼睛发红，眼皮下垂，工头手里拿着八号铁丝作的鞭子在他们后面走来走去，有不少孩子被这些工头打得号叫爹娘。如果一个孩子错拉断了一根茧丝，工头就舀起铁锅里的开水淋他的手臂作为惩罚。在上海的炎热季节，这些车间的温度是那么高，我在那里站几分钟就已经支持不了。我一直建议工厂老板改善设备，但他们总是置之不理。这些孩子的工资真是少得可怜……。”

“有一个圣诞节的早晨，我去检查一个青红帮头子开的工厂。车间的地面上布满了工人的尸体，他们都只是一个退火炉爆炸的牺牲者……但这个厂里的老板娘——一个胖得象母猪的女人——这时却仍在殴打一个正在干活的学徒。我建议她把工厂的设备作点初步的改进，她一听就火冒万丈，骂个不停……。”

“……有一个缫丝厂的楼梯扶手断了，十三个孩子被踩死。一个橡胶工厂发生了爆炸，四百个女工被炸死。一个赛璐珞厂爆炸，九十一个女工和童工被炸死……这样的事层出不穷，每天都有。”

这只不过是中国工人在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下一些突然暴死的情况，但每天在积劳成疾中慢慢死亡的人却更是不计其数。艾黎有一天发现在电池厂的许多学徒，还没有到达成年，就已经在慢慢地死亡。这使他想起，他们身体内一定中了不少铅毒。有一个铬板工厂全是由一群“有病和疲劳的孩子操作，工时是意外地长，工作条件是难以形容地原始，”他相信这些孩子的体内一定含有毒物不少。当时有一个在上海开业的美国医生马海德，是他的朋友。他收集了这些孩子的小便，要求马海德作一次检验。检验的结果，完全证实了他的推想。怎么办？

“这不是单纯医药可以治疗的疾病，”马海德说，“根本的办法是把整个制度作一次彻底的改变！”

当时另一个美国人，《大地的女儿》的作者斯沫特莱也在上海。艾黎带她到这些骇人听闻的“血泪车间”去巡视一番——这些“血泪车间”在这个上海的所谓“模范租界”内却是那么多！

“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艾黎在巡视了“血泪车间”后对斯沫特莱说，“这样一个局面就无法推翻？”

斯沫特莱紧紧地握着艾黎的手，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她用坚定的语调说：

“那末我们就马上开始为这种改变而工作吧。”

就在这段期间，艾黎的一位名叫巴林博士的朋友来看他，同时还送他一本书：《资本论》。巴林博士是一个英国人，

文质彬彬，似乎脑子在经常思索问题，“博士”这个头衔对他倒似乎很相称。他的社会职业是在上海一个美国人办的英文报纸《大美晚报》当编辑。这个报纸是统治上海的外国资本家的喉舌，但他在一个机构里占一个位置却给他带来许多便利。在这个位置的掩护下，他可以和中国人民一道做许多反帝、反法西斯、反中国反动派的工作。他理解艾黎的感情，也懂得这个年轻的新西兰人所面临的苦恼。

“你不是痛恨现状么？你不是想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现状么？”他对艾黎说，“那末你就得好好研究一下理论，找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以及消灭这种现象的办法。好好地读一读这一部书吧。”

艾黎尊重这位“博士”的学问，也尊重他的为人。他不折不扣地接受了他的忠告，认真地研读起《资本论》来。但要透彻弄通这部书上所讲的道理，光凭“苦读寒窗”是不行的。他还得联系实际，得与人讨论，交流心得，解释疑团。巴林博士已经估计到，这种情况在研读这部书的过程中一定会发生。

有一天他和一位名叫汉歇普的外国人来看艾黎。他们交换了一下有关学习《资本论》的心得以后，巴林和汉歇普便向艾黎同时提出了一个实际问题：组织一个马列主义小组。这个想法与艾黎的想法不谋而合，很快他们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于是上海的第一个国际“马列主义小组”就成立了。

所谓“国际”就是因为这个小组的成员不仅有上海不同

国籍的外国人，还包括在上海做地下革命工作的中国同志。他们来自各种不同的生活领域。在外国人的成员中，有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美国医生马海德、英国工程师干普林、德国文化工作者美丽德·玛娅、加拿大记者布朗……他们不单是研究马列主义，他们还研究时事：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恐慌、法西斯的兴起、蒋介石的反共“围剿”、上海的阶级斗争……。当然，他们更要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革命斗争。他们所研究的问题一天一天地在增多，他们所接触的方面也一天一天地在扩大。

艾黎开始接触到了许多中国的进步文化界人士，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鲁迅和茅盾。鲁迅赠给他《狂人日记》和《苏联版画集》。在和鲁迅的交往中，他不仅在政治的理解上得到许多启发和帮助，同时在文学方面也踏进了一个新的大门。他是一个诗人气质很浓厚的人，平时他也偶尔写些诗。从鲁迅的启发中，他开始懂得，写诗并不是单纯为了抒发个人的感情。它有更崇高的目的：诗应该是代表人民的呼声。在新的感情的激励下，他开始把写诗也当作一个严肃的革命工作来看待——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在国外发表了数以千计的诗篇。他还开始学习中文。因为他觉得只有这样他才能和中国人民打成一片。

和中国的革命者及文化人接触，学会了中国语言，使他对于中国的知识面从上海租界扩大到全国，从古代贯穿到今

天。这也更进一步加深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感情和理解。

这时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把他从消防队调到工业管理部门，任命他为公共租界的工厂总检查员。工部局是国际帝国主义统治上海的行政机构。这时艾黎已经懂得了一些马列主义，并且也学会了一些斗争的策略。接受这个“任命”，他可以更好地接触到中国的工人阶级，而且这种接触完全具有“合法性”。当然这并不是说，有了这个合法身份，再加之一个“白种人”的面形，做起工作来就可以不需要技巧。租界上的洋人统治者，对于在他的鼻子底下展开的所谓“非法活动”，并不是在睡觉。

有一天，一个非常令人悲恸的消息传到艾黎的耳里来了：上海“马列主义小组”的发起人巴林博士在住宅里被人暗杀了！上海租界上的“秩序”是靠巡捕房来维持的，而巡捕房的基本力量则是来自上海的青红帮——蒋介石就是青红帮的一个成员，是青红帮头子杜月笙的得意门生。巡捕房的那些“包打听”与青红帮的关系可以说是如胶似漆，分不开来。事后查明，巴林博士的暗杀者就是青红帮的成员。但一个“堂堂的白种人”却被有色“劣等民族”中的流氓所杀害，这不仅是对巡捕房的一个讽刺，也是对上海白种人统治阶级的一种侮辱。怎样使这个预谋的事件可以自圆其说呢？公共租界的当局于是便公开宣布：“《大美晚报》的编辑巴林博士因一时神经错乱自杀。”

这对艾黎说来是一堂很好的阶级斗争教育课。什么“优